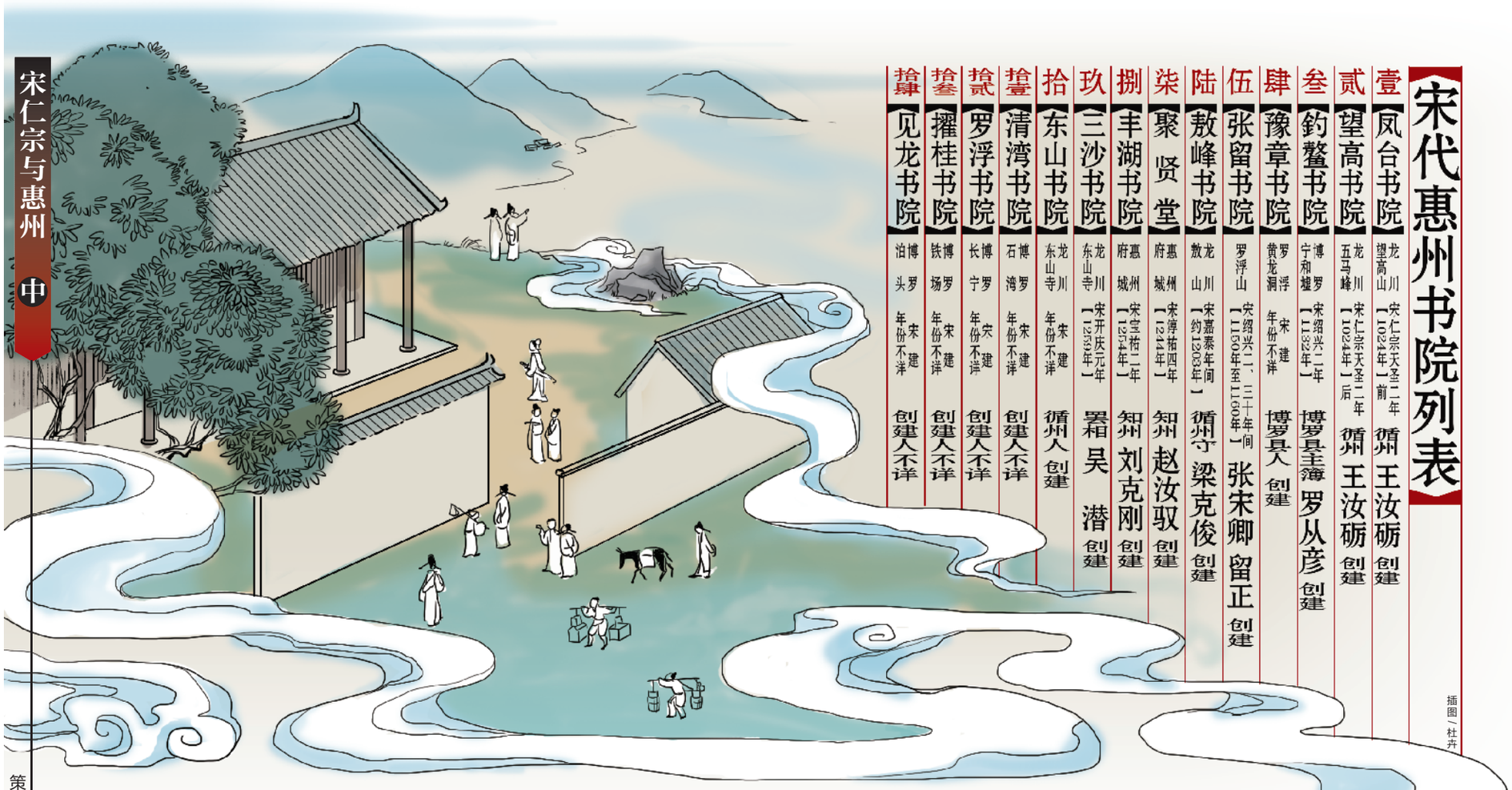
宋仁宗与惠州 中

策划统筹/陈骁鹏 马勇



插图/杜卉

西湖、罗浮胜景中，都曾有琅琅读书声

宋代惠州 至少有14所书院 广纳孔子门生

作者/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千载讲堂人仰止，时从四百望崚嶒。”这是明代博罗举人韩晟描述宋代惠州书院兴盛境况的诗句。自宋仁宗改革科举制度后，惠州崇文兴教，仁宗朝的工部尚书、惠州籍人王汝砺，在惠州创立了宋代第一个书院。

此后，罗浮、西湖等地，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有记载的就不下14所。朱熹的师公、宋代理学大家罗从彦，大宋丞相留正等都先后在此执教、读书。丰湖书院更是传承久远，从宋朝延绵至清代。

壹 仁宗朝尚书创建宋代惠州首家书院

早在1500多年前，就有文人高士在罗浮隐居读书。据方志记载，晋宋之际，瑯琊人王叔之携家人投靠广州刺史王镇之，“爰罗浮林壑之胜，筑室凤凰洞之南，携子弟读书其中，自称处士”。

当然，这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书院。一般意义上的“书院”，指的是既藏书又讲学、具备了教育机构功能的书院。这种书院的建立始于唐末五代，但数量不多，影响亦有限，真正兴盛是在入宋之后。

以现存文字记载看，惠州最早的书院诞生于南汉大有年间（公元940年前后），当时的祯州（惠州古称）刺史黄励为躲避严刑酷法，“弃官入罗浮山筑书院于水帘洞左居焉”。黄励创立的黄子书堂比始建于北宋景德年间的英德涵晖书院要早半个多世纪，堪称岭南书院的前驱。

入宋后，惠州文化教育有长足的发展。祯州为避太子赵祯讳改名惠州，赵祯就是宋仁宗。正是仁宗朝的工部尚书王汝砺，创建了宋代惠州首家书院。

王汝砺是北宋佗城（今属龙川）人。青年时期，他就在望高山下创宋代惠州首个书院——凤台书院，教导族内子弟。宋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王汝砺中进士，官授潮州刺史，升工部尚书，颇有治绩。晚年致仕回乡，他又于五马山下创立望高书院，仍以培育后进为乐。

在书院里，王汝砺除与朋友读书吟咏外，尚兼督教乡族子弟，教育功能凸显，显然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书院。

贰 朱熹师公与南宋丞相先后执教罗浮

自王汝砺后，罗浮、西湖书院众多。根据清光绪《惠州府志》记载，惠州于宋代创建的各类书院，有案可稽的就不下14所，甚至有学者提出观点称：“宋代广东的学术中心地在罗浮。”

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宋仁宗重视教育与师道，“学校之设遍天下”，以及理学的昌炽等等，都有极大的关系。史家有云：“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

宋代惠州书院的兴起，起始于北宋仁宗时期，而真正兴盛，却在南宋时期。可以说，以仁宗朝为代表的北宋是继隋唐初开惠州文运之后蓄势待发阶段；而真正形成惠州历史上第一次办学高潮而又最能体现宋代惠州文化教育水平的，是南宋时期蓬勃兴起的书院讲学，这对惠州文化教育的影响是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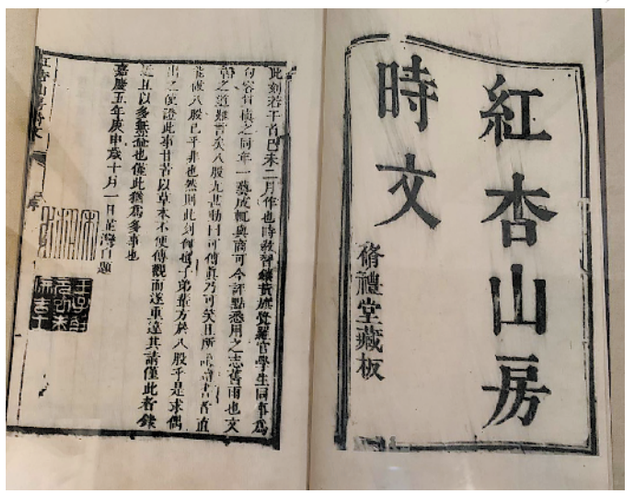
南宋时惠州的书院与理学有极大关系，位于博罗宁和的钓鳌书院就是其中的代表。书院创始者罗从彦（1072年—1135年），祖籍江西豫章，曾任博罗县主簿，是著名理学家杨时的高足，又曾问道于程颐，是宋代理学“道南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再传弟子朱熹就曾评价说：“龟山先生（即杨时）唱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语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罗（从彦）公，盖一人而已。”

在博罗县主簿的任上，罗从彦应广州太守周侯绾之请，于罗浮建设了钓鳌书院。这样一位理学名儒设席罗浮，钓鳌书院的影响可想而知。在惠州以书院讲学的方式传播理学思想，他是最早的一位。正是他在钓鳌书院的教育实践，使宋代理学的文化精髓走出学者书斋，向下扩散至惠州民间，为后来岭南理学的兴盛播下了第一批思想种子。

“千载讲堂人仰止，时从四百望崚嶒。”这是明代博罗人韩晟拜谒豫章先生罗从彦祠堂时写的诗句。以罗从彦为代表的一批书院学者在罗浮、西湖读书著述，聚徒讲学，育教人才，为开启惠州文化教育一代新风立下大功。

罗从彦之后，惠州本土的优秀人才也渐次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留正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留正原籍泉州永春，少时游学惠州，在此娶妻生子，以丰湖为家，在罗浮读书。宋绍兴年间，留正以归善县籍应试，中进士，官至右丞相，封魏国公。

为纪念留正及另一位学者、博罗人张宋卿，后人在二人当年读书讲学的罗浮水帘洞创立了张留书院。从此，张留书院书声琅琅，一直到将近两百年后的元末时期才荒废，旧址更是一直保留到清末。



清代丰湖书院山长宋湘编写的教材 吴大海 翻拍

叁 西子湖畔也传出琅琅读书声

继罗浮之后，刚刚建立的惠州府城西子湖畔也吹起书院讲学之风。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赵汝驭任惠州主官，在郡城西南银冈岭建聚贤堂，祀陈偁、苏轼、唐庚、留正等贤达共十二人，名十二先生祠。聚贤堂也是古代书院的一种，即祭祀式书院，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众先贤的定时祭祀，以体现对儒家文化道统的尊崇和继承。标榜先贤以激励后学，这正是书院思想教育的一大特色。

宋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惠州知州刘克刚改聚贤堂为丰湖书院，不但规模扩大，功能增加，制度也更趋完备；特别是“以州学教授兼山长”的举措，使书院带有半官学的色彩，师资和经费更有保障。

在宋代，丰湖书院不但代表了惠州书院的最高水平，也是岭南书院的典型代表之一。杜定友在《广东文化中心之今昔》一文中指出：宋代广东正式书院，“以南宋嘉定间之禺山书院、番山书院、相江书院、丰湖书院为最善”。

刘克刚字处和，福建莆田人。据光绪《惠州府志》介绍，他在惠州知州任内“清俭治办，修弊起废”，有人讥诮他自奉过俭，如穷书生，他不以为意说：“吾积至万缗，则诸邑宽剩，铁醋息钱可罢矣。瘠一身以肥一群，庸何伤？”可谓掷地有声，尽见儒者济世的胸襟抱负。

刘克刚对振兴地方教育尤其热心，慷慨解囊创建丰湖书院，就是他的一大手笔。后来他不幸染疾卧床，“病剧，尚延州文学（主管教育事务的官员）至卧内，再捐羡钱千缗增学舍，明日卒”。对教育如此眷怀于心，至死不忘，令人感动。

刘克刚之后，丰湖书院陆续有修葺，直至元初，院内的六君子堂、四斋、十二先生祠都因战火倾颓。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山长黄赵孙重建。明洪武初，改为县学。其时距聚贤堂的创立，已有一百四十余年。此乃惠州丰湖书院历史的前半段，至于后半段，就得说到几百年后的清康熙年间，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文脉调查

千年丰湖书院今成国学圣地

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天’对应‘事’，‘地’对应‘物’，‘人’对应‘关系’。”今年1月4日，广东罗浮书院名誉院长泰然在丰湖书院乐群堂里主讲《阳明心学的思想智慧》。这是疫情发生前，广东丰湖书院举办的第二十六期国学公益大讲堂。千年来，丰湖书院作为岭南四大书院之一，培养了大批人才；如今，这里成了文艺青年最喜爱的“网红文化圣地”，为传承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前身为“十二先生祠”

丰湖书院创建于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其前身是为纪念陈偁、苏轼、陈莞佐等十二位名儒而设立的“十二先生祠”，初址在桥西银岗岭，此后经过多次重建。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5年），惠州知府王燏在今址重建书院，后来书院再度荒废，新任惠州知府伊秉绶于清嘉庆六年（1801年）斥资白银五千两将其重建，继任者罗含章广聘请名士，一时间“从者云集，人竞向学”。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丰湖书院停办。短短百年，丰湖书院走出了江逢辰、李绮青、许寿田等著名的“丰湖十子”，时人将惠州丰湖书院与广州广海学堂、肇庆星岩书院、顺德容山书院并称为“广东四大书院”。

悠久的办学历史让丰湖书院所在地受到历代主政官员以及教育者的景仰，都认可这里曾是历史上惠州最高学府的所在地。2008年，惠州市开始恢复丰湖书院为名胜景点，重建了门楼、尚志轩、藏书楼、文昌阁等历史建筑和其他人文景点。2013年1月，丰湖书院建成开放。

重建后变身国学讲堂

但单纯只做景点，实在太浪费这块宝地。据西湖景区管理中心主任黄伟锋介绍，从前教授儒家经典的乐群堂里现在时常开设国学讲座，剪纸、插画等课程吸引了大量的文艺青年，这里正在打造惠州的国学大讲堂；书院还新设立了知致苑、格物斋，作为小说、诗歌、美术、书法等创作场所。

藏书楼里也设有拓片体验项目，游客可在此体验，并将自己亲手制作的、有数百年历史底蕴的丰湖书院碑刻拓片带回家。他还用一年多时间引入社会资本，用展览、讲座等文化项目将90%以上的闲置建筑一一填满。

文学、非遗、西子禅舞、名家书画……人文气息对游客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西湖景区管理中心副主任刘梓纯介绍，2017年时，整个西湖景区的游客访问数量是800多万人次，而丰湖书院的游客访问量仅有90多万人次。引入文化事业、企业之后，丰湖书院的游客访问量在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突破百万人次，2018年甚至达到111万人次。

文脉今昔

“铁面御史”创办崇雅书院

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创立于宋代的惠州诸多书院，由于年代久远，大多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然而，就在惠州惠阳，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书院得以完好保留，这就是清代“铁面御史”邓承修创办的崇雅书院。百年来，这座学校培养了邓仲元、邓演达等多位风云人物，曾有“东江革命摇篮”之美誉。今天，崇雅书院化身崇雅中学，依然源源不断地在为惠州培养着青年人才。

晚年返乡办教育

邓承修是惠州淡水人，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历任监察御史、鸿胪寺正卿等显赫官职，弹劾过云贵总督张凯崇、大学士及军机大臣宝鋆、大学士左宗棠等，在御史言官的位置上敢于进谏、揭露贪官污吏，被誉为“铁面御史”。1888年，邓承修告老还乡，曾主讲惠州丰湖书院；次年，他又创办崇雅书院，致力于振兴家乡教育事业。

“作为东江地区为数不多的百年老校之一，崇雅中学具有悠久的革命传统，曾有‘东江革命摇篮’的美誉。”崇雅中学办公室主任王宇忠介绍，一百多年来，崇雅书院培育的人才数以万计，遍布世界各地，其中郑仕良、邓仲元、邓演达、郑怀昌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就是杰出的代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淡水地区第一面红旗就在崇雅中学升起，崇雅书院楼也曾是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军行营旧址。

崇雅书院 崇雅书院供图

邓承修 吴大海翻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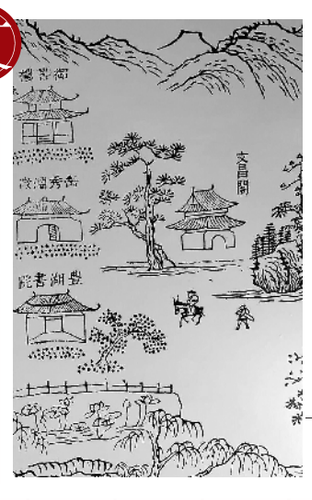
老书院正在维修

2015年，崇雅书院被列入惠州市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就位于惠阳区淡水街道崇雅路崇雅中学的校园里。

据介绍，这崇雅中学书院楼，距今有约130年的历史，主体为木质结构。该楼于2009年经过再次重修后，被学校用作校史室、叶挺将军事迹展览厅，是学校开展校史教育和德育教育的重要基地。

王宇忠说，近年，学校管理人员发现书院楼有白蚁筑巢，立即请专业人员检查，证实四条落地大柱、二楼木地板、屋顶部分横梁等均已被蛀，情况严重。经向上级部门申请并批复，崇雅中学已于今年5月启动了书院楼重修工作，预计半年时间便可完工。

文史杂谈



载于《惠州西湖志》的丰湖书院地图 吴大海 翻拍

古代书院为何多藏身于山林之间？

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但凡古代留存至今的书院，哪怕只剩下遗址，大都被修整恢复、辟为景点了。之所以能成为景点，一方面因为它们有历史文化积淀，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就建在风景优美的山林之间。

就近来说，惠州历史上的书院，如钓鳌书院、张留书院，就建在罗浮山中；而丰湖书院，则建在西湖之畔。广州的粤秀书院，建在越秀山群岭之中；萝岗的玉岩书院，则背靠萝峰山，旁边就是“萝岗香雪”。

至于历史上最著名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就更不用说了。岳麓书院位于岳麓山风景区里，白鹿洞书院则直接建在庐山五老峰上。

古代官学多在闹市之中，为何书院却多选址于郊外风景优美之地？

这还要从书院的源头说起。真正意义上的书院从五代的南汉算起，进入宋代，较早且出名的是范仲淹曾主持的南都书院（后更名为应天书院）。该书院虽然不在山林之中，却也在风景秀丽的商丘南湖之畔。

宋代是书院建设的井喷时期，而此后建起来的书院，多选址山林美景之中。

为何井喷？这是因为唐末至五代战乱频仍，唐代官学体系被破坏殆尽。赵匡胤建立北宋后，国家安定了，民众教育需求恢复，但当时百废待兴，官府无力快速兴办起官学体系，在这个空当里，教育需求被民间办学承担起来了。

乱世之中，士人躲在山林中避难，他们利用自家藏书，“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读书之所”，他们一边读书一边教书，一批书院悄然兴起。在优美清静的环境中，“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书院的基本功能，应包含藏书、育人、讲学等。它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兼有书斋、私学与藏书机构等功能，但又哪个都不是，它是升级版，是综合体，可以满足知识阶层的多种需求，因此也成了部分古代士人读书入仕外的另一种处世方式。

儒家秉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融会在士人精神中，这使得古代读书人能够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无障碍地完成身份切换。学而优则仕，能跻身统治阶层，就为君分忧、为民解困；若仕途不顺或遭遇战乱，或告老还乡、退隐山林，就继续修身、齐家，并担起教书育人之任。

而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历来不缺精神追求和审美志趣，且他们对精神的追求很多时候要高于物质追求，“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生活可以简朴些，但优美的环境等不容放松。对于用来传授“圣人之学”的书院，他们提出更高的环境要求，更是必然的。

另外，从儒释道交融的角度讲，书院躲进山林也是必然选择。中国文化发展中儒释道互鉴互融，很多精神追求是一致的。比如都追求清静、内省，修身、修心等。因此创办书院和创办佛刹道观的精神及审美追求有一致性，都首选山林清幽之处。书院的氛围、管理方式、研学制度等，亦有类同和相互借鉴之处。

古代书院就是中国特色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现代人去到那样的环境里，依然会感觉倾心神往。毕竟，古人与今人，心灵的追求还是有一致性的。